



苏俄的阶级与社会

〔英〕默文·马修斯著

商 务 印 书 馆

苏俄的阶级与社会

〔英〕默文·马修斯著

郑州大学外语系集体翻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79年·北京

Mervyn Matthews

**CLASS AND SOCIETY IN
SOVIET RUSSIA**

First published in 1972

Allen Lane The Penguin Press, London

内 部 发 行

苏俄的阶级与社会

〔英〕默文·马修斯著

郑州大学外语系集体翻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印 刷 三 厂 印 刷

850×1168 毫米 1/32 12 印张 280 千字

1979年8月第1版 197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0 册

统一书号：11017·441 定价：1.10 元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默文·马修斯（Mervyn Matthews）是英国社会学家，曾在莫斯科居留三年，搜集了大量苏联的国民经济和社会调查的统计资料。作者运用资产阶级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对苏联的社会结构、政治、教育和就业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而写成此书。

尽管这是一本资产阶级社会学著作，但本书对苏联社会各阶层在教育、就业、工资收入、生活水平、生活方式等方面列举的调查资料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苏联社会的一些实际情况，可供我们在研究苏联社会状况方面参考。

由于本书作者的资产阶级立场，书中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的学说以及列宁和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苏联的社会制度作了一些歪曲的和污蔑性的评论，希读者在阅读时注意予以分析批判。

目 录

序言	1
导言	3

第一部分 苏联的社会结构

第一章 人口统计的背景	13
第一节 1914 年至 1969 年人口增长情况	15
第二节 1966 年的苏联人口的金字塔	28
第三节 民族	33
第四节 城镇和村庄	36
第二章 官方关于阶级与社会发展的理论	44
第一节 列宁与布哈林论社会差异	49
第二节 斯大林的表述	52
第三节 赫鲁晓夫的新做法和新的批评	58
第三章 工人与农民——一些制度上的差别	65
第一节 居住和就业	66
第二节 工作条件和社会保险	70
第三节 收入的来源	74
第四节 生活标准	76
第五节 教育水平	83
第四章 富裕的和贫穷的苏联工人	85
第一节 收入的分配和政府的政策	86
第二节 工人阶级的贫穷	94

第三节	特权阶层的收入·····	104
第四节	生活方式与化钱类型·····	107
第五节	生活方式与时间的支配·····	110
第五章	苏联工人的工作和教育·····	121
第一节	技能的分布和机械化·····	123
第二节	职业的声誉·····	132
第三节	职业与劳动态度·····	136
第四节	普通教育与工人阶级·····	143
第五节	教育与劳动态度·····	147
第六节	知识分子的范围和定义·····	154
第七节	职员和服务人员·····	161
第六章	集体农庄社会·····	163
第一节	农庄的职业结构·····	165
第二节	集体农庄在收入方面的等级制度·····	172
第三节	地区差别问题·····	177
第四节	苏联农村的生活方式·····	182
第七章	农村人口的外流·····	199
第一节	主要的流动·····	200
第二节	一些地方性的问题——国营农场与集体农庄·····	207
第三节	移民——动机和年龄类别·····	210
第四节	在城市定居·····	218

第二部分 政治、教育和就业

第八章	党与社会·····	227
第一节	党的成员和社会集团·····	230
第二节	入党或不入党·····	239
第三节	群众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定义和衡量·····	243
第四节	作为积极分子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突击工作者·····	256

第五节 对待社会—政治活动的态度·····	260
第九章 苏联的学校和社会·····	268
第一节 托儿所和幼儿园·····	271
第二节 普通教育·····	272
(一)普及的范围和社会上的人材选拔·····	275
(二)科目、课程差别和专科学校·····	280
(三)部分时间制的教学机构·····	287
第三节 技术训练机构·····	292
第十章 挑选学生问题·····	297
第一节 政府和高等学校·····	297
第二节 赫鲁晓夫的招生政策·····	301
第三节 六十年代学生的社会出身·····	309
第四节 赫鲁晓夫的方案遭到批判·····	313
第五节 新的做法·····	316
第十一章 从学校到工作——青年就业问题 ·····	319
第一节 劳动力市场的一些秘密·····	321
第二节 两种青年失业现象·····	324
第三节 一种普遍的现象·····	330
第四节 赫鲁晓夫的消减剂·····	331
第五节 苏联青年就业介绍机构的出现·····	338
第十二章 知识分子的工作安置 ·····	345
第一节 计划制度·····	347
第二节 计划与现实·····	349
第三节 社会反应·····	355
第四节 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	360

序 言

任何人坐下来写作对苏联进行“社会学”分析这类性质的书，都必须预料到麻烦。即使写书的人经过长期努力得以完稿，但是等到书印刷得很清楚并装订得很美观最后问世时，他所能指望的也只能是批评。

写书的人知道，最优秀的俄国历史学家会因为书中缺乏对现世的深刻分析而感到吃惊，并拿起笔来写一篇文辞优美的也可能是正当的抗议。在幸运一些的国家里，社会学家惯于从数以吨计的多如砂砾的统计资料中挑选材料，他们自然会认为，根据如此狭隘的事实来写这类著作，是荒谬的，于是一跃而起奔向打字机，把他们的这种思想记录下来。那些了不起的智者，如果居然能不厌其烦，肯读一读这本书的话，他们就会认为这本书足以进一步证明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不存在的。虽然这本书决不是一本“反苏”著作，但是作者不能指望特拉佩兹尼科夫先生及苏共中央其他同志会作出积极的反应。

在这种情况下，唯有一股强烈的热情（有人可能说是蛮勇）才能促使他去做这件事情。或者是因为他相信毕竟可以写出一些新鲜有用的东西。我之所以被说服继续写书，其原因或者就在这里。如果没有许多朋友和同事的鼓励和帮助，我是不会这样做的。我得感谢哥伦比亚大学俄国问题研究中心的马歇尔·舒尔曼先生，因为他邀请我到纽约，在该研究中心和大学图书馆工作三个月。这段经历是十分愉快和宝贵的，使我能够为本书的几章搜集资料。

这种研究必须依赖构成其它学科内容的材料，这些学科主要是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和教育学。我当然不能自称我已经很好

地掌握了所有这些学科。为了尽量减少我的错误，我曾请一些非常杰出的有才干的学者审稿和评论，经他们审评的部分都是他们最内行的问题。在这方面我是十分幸运的。

格拉斯哥大学的J.纽思先生惠然为我指出关于人口统计那一章的一些错误和疏漏之处。伦敦经济学院的I.拉彭纳博士对于我在阐述苏联意识形态和社会理论方面存在的弱点，给予指点。牛津圣安东尼学院的米歇尔·凯撒先生对经济和计划方面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评论。圣安东尼学院的哈里·威列特先生和谢菲尔德大学的埃佛列特·雅各布斯先生帮助我从苏联集体农庄的经济和法律迷宫中找到了一条出路。伦敦经济学院的伦纳德·夏皮罗教授对苏联党的了解是俄国以外很少有人能超过他的，他审阅了第八章；从他对这一章的十分中肯的批评中我获益不少。牛津大学教育系的D.哈欣斯先生和伦敦大学的J.托米艾克先生就教育方面的材料提出了评论。格拉斯哥大学的马丁·迪尤赫斯特先生迅速而仔细地阅读了几乎全部手稿，从而大大提高了稿子的质量。戴维·夏皮罗先生费心通读了最后一稿。我尽量采纳了他们写在稿子上的大部分意见；由于时间紧迫及稿子结构上的某些困难，使我不能全部采纳这些意见。我当然不可能请每一个人阅读全稿；任何遗留的错误，用标准的话来说，完全是我自己的责任。

我十分感激纳菲尔德基金委员会及时给予财政上的支持，使我能够访问国外的一些图书馆，并在国内聘请一些人做研究上的辅助工作。我在致谢时不应遗漏我在萨里工艺大学的同事们，他们为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保护，使我不受这种流行的观点的干扰；教师应该只管教学，不鼓励他们浪费时间去从事写作。最后我要向我在本书中曾引用和提及他们的著作的那些苏联和海外的学者致谢。没有这一批资料，我是决不可能从事此项研究的。

导 言

苏联社会的发展及其结构不仅是社会学家而且也是关心苏联的每一个人所极其感兴趣的课题。幸运的是苏联目前的统治状况再次容许苏联学者研究与此有关的一些问题，并发表他们的一些调查结果。

在苏联，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传统是在二十年代后期开始中断的，这个情况持续了三十年，其原因无需多加解释。俄国本国的社会学虽然受到布尔什维克党人的严格限制，但在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初斯大林实行箝制之前却一直是一门多产的学科。此后，就连具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气息的以实验为根据的著作也遭到禁止，官方的统计，即概括性的材料，也不再公布了。苏联的社会学可说是1958年苏联社会学会成立时才重新建立起来的，而苏联的年度统计手册则是自1956年以后开始出版的。到了1959年，全苏人口普查也恢复了。当然，在苏联，由于这个国家的性质，局外人是完全禁止从事实地研究的。

在六十年代里发表了一批详细揭示苏联社会的结构及其发展过程的著作。但是在研究这些问题方面存在着的困难仍然不小。以一种消极的调子来开始是令人不愉快的，但是这些困难至少也得摆一摆，因为在许多方面我们都会感觉到这些困难，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我们的研究。关系到我们的主要是西方学者面临的那些障碍，虽然其中许多障碍也同样妨碍着苏联的调查研究人员。

这些障碍可说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和实践方面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来自官方关于苏维埃社会的理论所依据的前提。根据列

宁的看法，苏维埃社会将很快变得根本上不同于西方的资产阶级社会。导致阶级磨擦和各种社会罪恶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将要被废除。个人的本性将会发生明显的变化；社会纷争将会或多或少地消失；整个社会将变得“纯一化”。结果，象贫困、社会特权、犯罪和宗教信仰（列宁把它和迷信等同看待）这些较轻的罪恶就会象乖僻的柴郡猫^①一样，逐渐消失。

苏联的领导人由于受过无条件服从权威的传统教育，对于那些看来能支持上述论点的事实，总是予以过分的标榜；而对于那些太明显地与这些论点矛盾的事实就讳莫如深；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此外，还有一个造成歪曲的因素，那就是苏联的领导人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苏联当局有一种固有的倾向，好吹嘘苏联（或俄国）的成就，而不愿揭露它的失败。

对苏联问题的研究所遇到的实际困难，是由上述这些限制直接造成的。关于苏联的少数几种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成就的资料的相对的丰富，由于他们完全不报导那些不那么愉快的或者在意识形态上存疑的现象而被抵消了。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就研究一个社会而言，中心的问题是对社会分成阶层的了解。大多数社会学家喜欢把社会看作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等级结构，由他们通常称为“阶级”的各种人的集团构成。社会学所注意的许多问题就是从判定这些集团的大小和性质，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个人的控制而派生出来的。这当然决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但却是一种通用的方法。现在最重要的分层等级制之一是以收入多寡为根据的。不幸的是，苏联“官方的”理论坚持认为除了农民以外，所有的人都是相对“同一”的单一“工人阶级”的成员。苏联当局几乎不准公布任何有关收入分配的情况，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恐

① 柴郡猫是L.卡罗尔所著的童话《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一只神奇的猫，它在同爱丽丝谈话后逐渐消失。——译者注

怕这样做会暴露出某种特权阶层，从而使他们的观点失效。因此，企图根据收入把劳动者划分等级或划分为一种连续的整体做法，确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然而把将近两亿人合在一起总括为一个社会集团，却是一件荒谬的事情。

苏联当局封锁了许多似乎与他们公开宣布的社会统一的原则相矛盾的消息，但是我们还得公平地加以说明，在某些情况下只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搜集到情报，或者是因为那些搜集到的情报太不可靠，以致不能采用。其它空白包括以下各方面的资料：较为突出的社会罪恶，统治集团，大多数政治方面，某几类社会流动现象，失业和民族主义等。

我们的研究是建立在最近透露出来的少量确凿的事实之上的；这些事实就象在茫茫的大海上出现的一些小岛。我们可以使用的社会学资料最主要的来源是1956年以来每年出版的那一系列统计手册。这些资料汇编尽管有错误和缺点，但毕竟还是十分有用的。1959年和1970年人口统计的情况也是如此（尽管本书定稿时只得到1970年人口普查的初步结果）。我们搜集情报的第三个主要来源是根据社会调查（俄国人称之为“实际社会学调查”）演绎出来的社会学资料。最后还有由一些负责的新闻记者写的许多具有揭露性的文章，这些文章说明了一些问题，如果没有这些文章，这些问题就不会被人知道。已经发表的社会学调查结果显然只是搜集到的材料中的一部分，然而这部分材料却是饶有兴趣的，值得我们多评论几句。如果没有这些材料，我们在本书中所作的这种有限的研究也是不可能的。

只要数一数苏联社会学者已发表的著作，那么他们已经能够为我们说明的领域就一目了然了。最近为了供私人参考而汇编的一个包括八百三十个题目的苏联社会学著作的篇目（不包括对“资产阶级”论点的批评文章），其分布情况如下：

论题	篇目数
社会意识	130
社会学理论的一般问题:	
社会学及哲学	102
劳动社会学	89
人口:人口统计学,公共卫生	83
社会结构:阶级和社会阶层	77
社会调查的方法学、方法及技术	55
国家,法律,管理	52
城市社会学	46
群众思想的沟通,宣传,舆论	39
空闲时间与闲暇,闲暇社会学	34
农村社会学	33
青年的社会问题	30
家庭及其生活方式:妇女的地位	24
文化、科学及教育方面的社会学	21
个人与社会	16

本书以下各章利用了大部分上述分类中的著作。

我们一开始就应该回顾一下苏联社会人口发展的显著特点,这是符合逻辑的。虽然关于苏联人口发展史的许多主要特点的资料一直缺少,但是1959年一月人口普查结果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资料,值得作这样的回顾。根据年龄范围对苏联人口进行分析而编制的图表(“人口金字塔”)表明,其中有许多地方偏离了人们认为是工业化社会所有的“正常情况”。凡是呈现畸形的地方都可以由这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史予以一定的解释。这是一项很有趣的工作。

其次,我们要谈苏联社会结构的问题。我们已经注意到社会学界在考察最原始的社会以外的社会时,倾向于用彼此间存在着等级关系的阶级去加以说明。然而给“阶级”一词下一个定义却是

一个复杂的课题。西方的社会学理论的教科书提出了一些可能的标志：除收入外还有职业（这一标志极其近似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生产资料的关系的概念）、教育、文化程度以及人们对自己“阶级”地位的看法。关于阶级的正确的定义一定要包括上述这些标志，也许还要包括其他一些标志。这些标志将会表明它们之间显著的互相关联的程度。

最正统的对苏联社会结构加以分析的学者摒弃大多数上述标准，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他们还没有采用这些标准。苏联官方关于阶级的公式只包括三个主要的社会集团，即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而大多数统计资料都是为了符合这个模式而加以裁剪的。某些行政的和法律的措施也是根据这种划分来实施的。由于上述这些直接理由，本书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探讨了“官方社会学”及其发展和真实性。

在第四章里我们转而探讨苏联“工人阶级”按收入划分阶层的问题；第五章则探讨按职业和教育划分阶层的问题。我们可以得到的关于这些论题的数字，在充分的程度上有很大的差异，即使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高度的关联，但是要把它们联系起来却往往是十分困难的。不过，将这些资料拼凑在一起，这些资料却为苏联的社会结构提供了一幅印象派的画像与我们过去曾有过的那个画像相比，这也许可以说是前进了一步。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都试图根据对时间的研究去表明收入、职业和教育的差别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为了这个目的，有时必须从那些旨在说明其它现象的或者其结果不曾全部公布的研究论文中取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慎重地提出上述缺点，同时又尽可能不违背作者本来的意图。职业和教育是人们通常用来划分苏联“知识分子”的标志，因此我们选定在这一章里来说明“知识分子”一词的较为普遍的定义。当然，在论及城市收入及其他方面时，我们还要涉及知识

分子。

第六章专门谈苏联乡村的社会结构，并且特别着重集体农庄。我们有无可辩驳的理由去分别对待城乡社会，尤其是因为集体农庄是农民的最后归宿。附带说一句，这是苏联社会学家的发现（与人口普查和统计报告相反）是特别有价值的领域之一。再下一章，我们探讨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问题，我们称之为人口流离土地。既然农民转变到工人阶级地位的这种变化代表着一种上升的运动，那么，就可以把这种变化看做是苏联社会流动的一种形式。

本书第二部分专门论述三个题目，对作者来说这些题目都是既重要又特别有兴趣的。（著书的好处在于作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书的内容。）第一个题目是政治社会学。苏联的政府制度是一种不容易对它进行深入分析的制度，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得到的资料都是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当然还有克里姆林宫学家非常彻底地研究出来的。我们从这些资料中选出几个方面来进行探讨，这些方面可以促使我们进一步研究社会结构；在我们看来，这些方面还没有人彻底研究过。这些方面就是我们选出的关于苏共与某些社会集团之间在数量上的关系和群众参加官方批准的具有政治目的的活动这个饶有兴趣的问题。我们希望这样能为我们所作的社会分析增添一个重要的政治背景；而无需重复其他西方观察家的话。这里附带说一句，本书引用的一些社会调查结果显示了颇为引人注目的政治分歧。

第二个题目是教育。我们选出各类教育机构与不同社会集团的关系作为考察的对象。我们用了一章的篇幅去论述普通中学以下各级学校的社会情况，另外一章则论述学生的社会出身。上述的研究除了其本身的意义之外，还进一步说明了苏联的社会流动情况。

最后一个课题是雇佣青年，或者更确切地说，安置青年去担任全日工作的问题。我们只涉及主要两大类求职者，即普通学校毕业生和高等及中等专科学校毕业生。在工业化社会里，找工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只有在情况不妙和出现失业时似乎才会引起公众的注意。我们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尽可能地说明苏联是如何进行安置工作的，此外还要研究他们在这方面的成败对社会所造成的后果。

对任何一个社会的研究，只要它能告诉我们所不知道的或者过去不愿相信的事情，那么，这种研究就是有趣的。这不可避免地将我们引到对比的问题，不是以历史的背景作对比，就是拿不同的社会来对比。我们还不妨问一问苏联社会变化得如何快及其与美国或英国的社会的异同到什么程度。

上述这些事情，我们只将间接涉及。我们主要关切的是，就我们的资料所涉及的年代里能够认识的程度去论述苏联社会的某几个方面。对同一领域作对比研究意味着移到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而这是作者一个人的能力所不能及的。我们曾作过历史对比和各社会之间的对比，但这也仅限于在这些对比看来特别可以做到的场合。由于相同的非常实际的理由，我们的论述不过多地涉及人种特征。苏联社会中其性质基本上可称之为欧洲型的那一部分是我们所主要关切的。

我们必须予以考虑的剩下的最后一个问题，是那个作为我们的研究基础的前提。研究一个社会，不能不事先对可掌握的事实作一些选择；与历史学家一样，社会学家要避免对问题作出偏颇的论断，就必须决定问题究竟是什么。

亚历克斯·英克尔斯博士多年来一直领导着对苏联社会的研究。他在最近一篇论述苏联社会发展模式的文章中指出，研究苏联社会的学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借助既有的型式或“模式”去进行

分析。^①在他看来，最有用的三个模式是(1)所谓“极权”模式，其中的决定因素被认为是一个拥有高度独裁的政府的强大国家机器；(2)“发展”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使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推动力量是主要的动力；(3)“工业”模式，其中占优势的因素被认为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拿苏联社会与美国和西欧的社会对比时，这个理论特别有用。正如英克尔斯博士所指出的，这些决不是可采用的全部模式。他进一步谈到了丹尼尔·贝尔先生的十个模式，甚至还提出：设想一个传统的沙皇因素占优势的历史模式可能是最合宜的。

我们自己研究时，曾试图就资料来源所容许的程度去说明那些通常吸引着社会学者在研究任何一个现代社会时的注意的现象。因而我们的论述应为许多学派的支持者提供一批论据，我们没有决定从这些学派中作出何种抉择。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抱着同情的，自信是客观的态度去说明一个主要属于欧洲的社会的结构和发展情况。

^① 见《观察》1966年七月号。英格尔斯特博士的著作很多，其中大多数为人们所熟知。他于1950年发表了一篇名叫《苏联的社会分层及社会流动》的文章，后来又把它收入《苏联的社会变动》(1968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一书中。这篇著作可以被看做是西方评价苏联社会结构的里程碑。